



DANG DE LISHI YU
DANG DE JIANSHE YANJIU

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研究



王炳林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DANG DE LISHI YU
DANG DE JIANSHE YANJIU

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研究

王炳林 / 著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侯俊智

责任编辑:吴广庆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研究/王炳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

ISBN 978-7-01-016320-8

I. ①党…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②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 IV. ①D23②D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8934 号

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研究

DANG DE LISHI YU DANG DE JIANSHE YANJIU

王炳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8.75

字数:410 千字

ISBN 978-7-01-016320-8 定价:6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
宣传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得到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研究基金资助。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进程与道路选择	1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
二、一二·九运动中“左”的偏向	6
三、长征的胜利是理想信念的胜利	17
四、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力量发展壮大的原因	20
五、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领导艺术	33
六、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命运	46
七、新中国成立前七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57
八、从乡村到城市的伟大战略转变	67
九、解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80
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大特色”	91
第二章 党的历史经验与党的建设	101
一、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的几个问题	101
二、为何一些执政党会丧失政权	108
三、维护和发展好党执政的文化资源	115
四、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19
五、牢牢抓住全面从严治党的主线	123
六、中国共产党开展学习的历史考察	127
七、学习型党组织的基本特征和建设路径	144
八、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	158
九、建设学习型领导班子	171
第三章 党的领袖与党史党建研究	176

一、中共党史研究的整体性原则	176
二、以人物研究促进党史研究	192
三、历史事实与历史评价	195
四、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197
五、毛泽东的党史观	208
六、毛泽东论“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220
七、毛泽东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历史贡献	229
八、朱德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40
九、邓小平的党史观	252
十、邓小平的品格风范	261
第四章 党的建设与党员干部思想教育	277
一、学习历史 资政育人	277
二、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基本经验	281
三、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287
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间的融合	298
五、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任务和要求	309
六、紧紧抓住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根本	320
七、坚定理想信念是永葆党员先进性的根本要求	323
八、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27
九、中国梦的内涵、意义及挑战	341
十、中国梦是人民的幸福梦	349
十一、在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中实现中国梦	356
十二、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	360
十三、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364
第五章 高校党的建设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370
一、执政能力建设与高校党建工作	370
二、推进高校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375
三、和谐校园建设中的宣传教育工作	383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引导学生	389

五、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390
六、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	398
七、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咨询辅导法	400
八、北京师范大学“邓小平理论概论”教学的实践与创新	408
九、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几个问题	417
十、增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教学的实效性	426
十一、加强师德建设 促进高校育人工作的深入发展	439
十二、大学教师要传播正能量	443
十三、努力做一名受学生欢迎的思政课好老师	448
后 记	452

第一章 历史进程与道路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①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学说，是 19 世纪 40 年代在欧洲形成的，但为什么在近 70 年后才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追求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主要是因为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后，世界形势和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适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土壤和气候。

（一）社会变革的迫切需求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实现翻身解放的科学指导思想，而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接受和运用这一学说的载体，即独立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国社会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施展威力的空间。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社会不需要变革、不寻求进步。众所周知，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① 本节内容曾发表于《中国教育报》2011 年 5 月 16 日第 4 版，原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促成共产党的诞生》。

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革新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不会选择旨在用无产阶级革命打倒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指导，农民群众也没有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和能力。不同的政治派别和政治主张都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过作用，但最终都没有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又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也没有受到削弱，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此，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中国究竟用什么思想武器来挽救民族的危亡？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从西方传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也徒有虚名，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旧的路走不通了，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出路；旧的思想武器不灵了，就迫使人们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成长壮大起来，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于是，选择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需求是马克思主义被选择的第一推动力。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曾作出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①

（二）榜样的巨大示范作用

中国人应当逐步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思想不能指引中国走出苦难时，便纷纷向日本及西方国家学习，企图从这些先进的国家学到救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但却屡遭挫折。特别是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它以残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不可克服的矛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陷入苦闷和彷徨中。

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虽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或是封锁消息，或是诬蔑俄国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有“杀人暴行”，但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还是通过各种渠道逐渐了解了十月革命的真相，逐步有了这样的认识：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俄国的国情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是中国的近邻，中国应该走和俄国一样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道路。当时苏俄政府的内外政策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苏俄政府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除旧俄国政府与中国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在华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建议两国建立平等关系，并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些举措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加坚定地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合理的制度。于是，向往俄国、走俄国人的路，就成为先进中国人的必然选择。由于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因此，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而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三）思想解放的有力推动

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封建主义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它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武器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批判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礼教。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机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新文化运动砸碎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思想上的藩篱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新学说便潮水般涌入，思想文化领域里一时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五四运动爆发后，随着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愈来愈大，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思想界更为活跃，各种学说异彩纷呈。思想的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辟了更宽阔的舞台。在各种学说竞相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逐渐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和组织工会。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走向实践，在实践中被选择。

（四）文化思想的相互融通

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选择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相通之处，很容易被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契机。张岱年曾从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若干基本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通之处。一是唯物论，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唯物论的传统，先秦哲学中最显著的唯物论是荀子的学说。二是辩证法，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已成为人们的常识；《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更精粹、更深邃的辩证观点。三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贡献，但在以前亦非全无端萌。在中国思想史上，有许多思想家谈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问题，《管子》云“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四是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吕氏春秋》中就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的思想，《礼运》篇中则提出“大同”的理想，大同社会的原则是“天下为公”。这种理想模式，与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向往的理想社会模式相吻合。所以，共产主义学说传来以后，进步人士是以欢喜的心情欣然接受的。当然，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唯物论还是辩证法，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

辩证法有很大差别，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但它们有相通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文化思想的融通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也是马克思主义被选择的文化心理基础。

（五）革命者的传播和实践

学者考证发现，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被介绍到中国，孙中山、朱执信、梁启超、刘师培等一些政治家和学者都在其论著中提到过马克思的学说，但只是作为西方新学说的一种被介绍，并没有在社会产生大的影响，也没有人信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早期的介绍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即形成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实践者。

五四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世界观转变的特征是抛弃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转向接受新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在北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很多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二是以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为代表的五四爱国运动中青年骨干中的左翼队伍。他们在比较各种新思想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世界观的基础。在这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中，既有像毛泽东这样在国内经过对各种学术思想和革命学说比较、鉴别之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也有像蔡和森这样走出国门“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留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

三是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转而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董必武回忆

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给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

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纷纷准备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1921年7月，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二、一二·九运动中“左”的偏向^①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它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新起点，对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成全面抗战的局面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为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这个规模巨大、持续发展的爱国运动也曾出现过“左”的和右的偏向，特别是“左”的偏向，曾使运动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为总结经验教训和探寻青年学生的成长足迹，对运动中“左”的偏向作一番解剖分

^① 本节内容曾发表于《党史通讯》1987年12期，原题为《一二·九运动中“左”的偏向之剖析》。

析，无疑是有益的。

（一）“左”的偏向的主要表现及危害

从1935年12月9日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一二·九运动坚持了19个月，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从运动爆发到1936年3月北平学生抬棺游行为第一阶段；1936年4月到1936年10月为第二阶段；1936年11月到七七抗战为第三阶段。依据这种划分，“左”的偏向在第一阶段表现得比较突出，在第二阶段逐步被克服。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的实质是行动上的冒险主义和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无限期罢课，打消耗战

1935年12月9日和16日，北平学生举行了两次示威游行，掀起了震动全国的抗日救亡巨浪。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学生热烈响应，先后举行了请愿、示威游行。此后，各地学生陆续罢课，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爱国学生的镇压。

在示威游行后学生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以适当的罢课来巩固运动成果是必要的。但是，学生没有在罢课达到一定目的后乘胜收兵，反而作出了无限期罢课的决定。1936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发表继续罢课宣言，认为“我们只有继续罢课，过去的牺牲才有意义，未完的工作，才能完成。我们的工作伟大的，我们的罢课，是最有意义的”，并表示“不达目的，誓不复课”。直到1936年2月7日，北平学联发表《复课宣言》，才结束无限期罢课的局面。1936年5月28日，为反对日本在华北大举增兵并杀害中国民工，天津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接着就是长时间地罢课。6月13日，北平学生响应天津学生的斗争，再次举行游行示威。17日，北平40余所学校70多位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各校自18日起实行无限期罢课，除非当局撤回解散学生救国会团体的命令，否则决不复课。北平学联还派人到天津联系，准备坚持联合长期罢课。这次罢课适逢1936年毕业的学生即将进行毕业考试，长期罢课将影响他们毕业。因此，许多学生要求复课考试，学生内部出现分歧，随即被迫复课。

两次无限期罢课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涣散了学生斗志，失去了学校当局、教师和社会各界应有的同情与支持。两次罢课都临近放假，客观上有利于反动当局利用提前放假的手段，以瓦解学生运动。因此反动当局借机开除了一批爱国学生，削弱了学生运动的力量。

2. 下乡宣传中的偏激行为

1936年1月初，平津大中學生500余人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到河北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北平学生组织扩大宣传团曾有三个目的：一是扩大运动影响，使运动向全国发展；二是能够在与工农的结合中提高学生骨干的觉悟；三是与冀南的农民暴动相结合，建立游击队，上山打游击。第三个目的反映了部分学生骨干“左”的偏激情绪。由于这个设想没有实现，此意图也就没有向广大同学公开。

在宣传过程中，“左”的情绪也时有表露。有些宣传口号过高，脱离实际。进步学生在宣传中所唱的《时事打牙牌》歌曲，有“苏俄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人人都工作”等与宣传抗日无关的歌词。中间学生对此不满，提出我们是出来宣传抗日救国的，你们把老百姓召集起来听这些不相干的东西有什么必要呢？一些激进学生只是热烈地拥护苏联，容不得反对意见，双方争论很大。中间学生喊“拥护政府抗日”的口号，激进学生则用“拥护抗日政府”的呼声把它压下去。结果学生内部分歧日趋明显。其结果是妨碍了学生团结，一部分学生退出扩大宣传团，提前返校，这就削弱了抗日宣传的力量。

3. 以“三三一”游行为典型的冒险主义

1936年2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诬蔑抗日救国活动为“扰乱秩序，鼓动暴动，危害国家”，规定军警可以枪杀游行的群众，逮捕“捣乱”分子，解散救亡团体。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在天津、北平、青岛、太原等大中城市公开逮捕学生，以武力压制爱国学生运动。在此以后的一个多月中，仅北平就有200多名学生被捕入狱。学生在狱中遭到严刑拷打和惨无人道的折磨。在这种白色恐怖下，学生运动应以校内活动为主，注意保存力量，避免硬碰，以待时机。但

学生却不顾险恶的客观环境，急于冲破这沉闷的气氛。3月31日，北平学生1000余人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大会，追悼惨死狱中的北平十七中学年仅18岁的学生郭清。军警特务将会场重重包围，在校门口架设机关枪，禁止学生出入。面对异常紧张的情况，开会的学生没有适可而止，反而提出了“准备流血”的口号，抬着空棺，从邻校孔德中学冲上街头，700余人举行了抬棺游行。结果，学生队伍被打散，50多人被捕，100余人受伤。

这次行动是英勇悲壮的，但却是一次脱离群众的冒险举动。正如刘少奇所说：“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如果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局商议，可以请学校当局教授讲演，也可以举行比较盛大的葬仪，就是说完全公开地进行纪念。”^① 冒险游行使学生运动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敌人费尽心机仍抓不到的、被列入“黑名单”的一些学联干部和民先队负责人，却在这次游行中被捕。包括学生会主席在内的北京大学4名同学因此被开除，削弱了学生力量。同时，一般学生群众的斗争情绪尚未恢复，他们感到进步学生可敬而不可近，致使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在一定程度和一段时间里脱离了广大学生群众。

4. 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救亡阵线，是学生运动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但是，一二·九运动初期这方面的工作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偏差。

首先，对中间学生不够重视。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部分学生把救亡斗争与读书学习完全对立起来，忽视了中间学生的读书要求，甚至给想读书的学生扣上“反动”“汉奸”等帽子，拒之于救亡阵线之外。罢课期间，进步学生组成的纠察队硬是把一些学生从实验室里拉出来。学生运动的许多工作只由少数进步学生包办，进步学生作出的决议得不

^① 刘少奇：《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火线》第55期，1936年4月15日。

到学生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结果部分学生对学生干部不满，出现了学生内部的纷争。“这一现象在六一三以前的北平表现得相当明显，而上海方面因此所受的损失更大。主要是为着统一战线的意见分歧，上海学生的救亡阵线甚至无形中存在着许多宗派观念。”^①

1935年年底，蒋介石要召集各校当局和学生代表赴南京“聆训”。北平各校代表80多人集会讨论，多数人赞成赴南京。但北平学联党团只注意到国民党搞欺骗的一面，而没有照顾多数学生特别是中间学生的意见，放弃了这次合法斗争机会。不久，北平学生又殴打了校当局指派的“听训”代表。当局为瓦解学生运动宣布提前放假，部分学生单纯地反对放假，组织纠察队在校门口站岗，不准学生离校。

上述做法影响了学生内部的团结，进步学生一度陷于孤立，中间学生被排除在运动之外，反而为反动派所利用。

其次，在师生合作方面，学生也走过一段弯路。从政治觉悟上看，教师队伍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很进步的是少数，与学生运动为敌的也是个别的。大部分教师是有学问、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处于中间状态。他们基本上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的。但是，学生对教师的状况估计不足，一二·九运动初期师生对立较为突出。教师对学生的行动稍有异议，便会遭到学生指责。广州一大学学生在罢课期间不仅对教授态度冷淡，甚至宣布全体教授几乎都是汉奸。清华大学教授因不满学生无限期罢课，曾宣布全体辞职，这种情况对学生运动的发展极为不利。

再次，没有争取学校当局这个暂时的同盟者。学校当局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学生运动能否顺利进行。学生应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利用学校当局维护学校尊严的愿望，力求其支持、同情学生运动或保持中立，这样才能为学生运动及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然而学生对此却缺乏认识。学生罢课后，北平各大学校长于1935年12月14日发表告学生书，“劝其复课”。对此，学生不但没有通过正确途径与他们商讨并妥善解决问

^① 华道一：《一二·九运动一年来之史的检讨》，见《一二·九运动资料》第2辑，第215页。